

# 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

舒晓昀

近年来,“历史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当代史学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这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19世纪以来,由于欧洲处于自然科学飞速发展的时期,科学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日益明显,科学的方法和概念渗透到其他领域,不能经受科学考验的东西可能失去存在依据。历史学家认识到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成了历史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实证主义史学率先将历史学全身心地投入科学的怀抱,许多学者将原来专属自然科学使用的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有人因此说:“史学自1800年以来经历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回顾以往我们可以看到,这场革命已经完成,它比以哥白尼的名字所标志的那场革命还要伟大。”这一切标志着历史学把科学性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

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直至19世纪,只要把一些理论用某种逻辑形式组成一个探讨知识的体系,就足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了。科学这一术语当时就是指有条理的整体。科学既包括人们用以了解自然和社会的系统方法,这些方法有发现新知识的方法和识别错误的方法,即科学的认识论,又包括依靠科学方法积累的知识本身。此外,科学还给人们提供了最宝贵的价值——科学精神。看来,科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又是一种研究活动。科学有它特有的范型,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原则等等。

科学本义应为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所谓客观事物包括自然和社会两大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当前,对于什么构成历史研究的主题、以及如何对这一主题进行学术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复存在一致的见解”。这是因为只有在认识达到一定水平时才可能如此。

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包括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两个步骤,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历史

---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艾克纳:《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伊格尔:《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学“属于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那一类学问,即属于我们提出问题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思维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一门科学。历史严格遵循问答规则。“历史学家,正如任何其他科学家一样,也是个不断提出‘为什么’这一问题的一种动物”;历史研究也使用假设,“历史学家在探索过程中所运用的假设的地位,跟科学家所用的假设极为相似”。历史假设使研究者对历史事实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堕入偏执的泥团,还为价值取向提供了学理基础。当代历史研究注重定量化和精确化,有的甚至要借助计算处理,但这些都属工具辅助手段。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历史学具有一些科学的东西。

在实证主义史学看来,所谓历史科学既是指处理史料的那种实证方法,又是指看待历史的客观主义态度。自然科学包括两工作:第一是确定事实;第二是发现与建构规律。在这种科学观的指导下,19世纪历史学家在研究中遵循的基本信条是:史料第一,历史学家应该让史料本身来说话,不妄加猜测,也不随意概括;不妄做褒贬,也不感情用事。史学界形成了运用自然科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实证主义思潮。人们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像自然科学家一样,“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成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信念。对科学方法的崇拜使许多历史学家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应用于历史学,认定可信的权威是事实,认为只要有科学的方法,“历史学是可以向完全正确的知识前进的”。即使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依然把科学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它同自然科学的差异只能表明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点。在历史学的科学性问题,新史学家认为,传统史学家把严谨的考据方法作为科学的方法,这只是表层的科学性,只有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计量方法才能使史学真正科学化,应该把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还要突破单纯强调史料考证的局限,提倡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的研究,重视概括和解释。年鉴学派“反对实证史学仅仅注意方法论(例如史料考订)的科学性而忽视历史解释的科学性,从而把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同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都联系起来。”

学科之间的界线并非一成不变的,历史学在很长时期也非独立学科,严格的学科划分是近代的事情。学科的划分反映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各门学科运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角度研究自然和社会,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知识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被切断。80年代中期,“史学危机”的说法引起史学家的共鸣,主要是在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的强大潮流面前,历史学家感到手足无措,惶恐不安,觉得自己由以安身立命的那些东西正在被动摇,而对那些扑面而来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方法又十分陌生,知识结构难以调整与更新,以至产生了将被淘汰的心态。长期以来,历史研究宁求其深,不图其广,实际上,科学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

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页。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1页。

刘昶:《人心目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190页。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4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23页。

陈启能:《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参见王学典:《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向其他学科开放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涉及其他领域,形成了许多最具活力而又取得巨大成果的交叉学科。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对历史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灵感源于现实生活,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的原理和理论是不能通过实验来证明的,因为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历时性,发生过的事件只能追忆不能完全重演,这造成了研究历史的困难。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找类似“科学实验”的研究方法,通过历史现象之间的比较从某个历史现象中验证或说明另一个历史现象,这种比较的方法不失为科学历史学的一种方法,当然只有在具有可比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比较。

历史研究的目标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目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并不是指具体的研究目标,而是指两者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卡尔指出:“科学家们、社会学家们以及历史学家们都在从事同一研究的不同部门的工作:研究人及其环境,研究人对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对人的影响。这项研究的目标是相同的:增加人对于他的环境的理解以及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就历史按照它自己的方法和技术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一意义来看,说历史是一项科学研究似乎是难以否认的。”

由是观之,历史学是一门科学。

## 二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解释现象、揭示本质、探索规律,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达到目的,一方面必须借用其他学科中能用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必须宏扬历史学的传统本色。但即使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史学,在取得巨大成就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其著作失去了读者,失去了社会效益,对人知之甚少。因此,人们不禁要反问: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吗?

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所引发的变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科学对人类文明发展必不可少,没有它,人类文明不仅不可能进步,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科学是我们智力的源泉,然而不是惟一的源泉。科学是核心,也只是核心而已。科学的发展给人们的认识造成了一种副作用,使得人们力争把一切都以科学作为归依。实际上,科学决不是人类文明中惟一在起作用的因素,人类文明不是科学独立自主宰乾坤,科学必须承认其他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真科学必须超越自身。科学所能做到的至多只是确定事物之间的关系,“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历史进程复杂多变,当科学运动发生时,其他变化也出现了,也就是说它们共同创造这个世界。“把这个时代的全部思想转变仅仅归结于科学革命的影响是错误的。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张总的错综复杂的变化之网,而且,很难说其中的任何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92页。

沃尔什:《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14页。

一种变化就是科学革命本身的简单结果。”“科学发展所经过的革命并非是乐善好施之举,而且对于‘人类的条件’来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进步。”由此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本身的不足。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有科学研究要求做到但又做不到的很多缺陷。严格的科学得出来的结论和发现的规律都是可以重演的,历史学无法用实践来检验它是否是科学。要证实任何命题都必须作一系列检验,这些检验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三种:相符性检验、普解性检验、精炼性检验。回顾就是历史,可作为一门科学来说,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它能经得起现实和未来的检验。屈维廉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的确,历史如何能是一门‘科学’?你可能解剖一个人的身体,由此而论证其他人的身体的一般构造。但是你不能解剖一颗心灵;即使你能够的话,你也不能由此而论证其他的心灵。你对于一个民族的两千五百万颗心灵,一点也不能科学地得悉。我们所知道的很少的事实,可能是其余事实的典型,也可能不是。”如果作为一门科学,它只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却不能或经不起现实和未来的检验,这门科学就是不完善的,就带有局限性。

历史学有自己的学科个性,仅凭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解释历史,因为,“道德领域缺乏物理世界的那种秩序。因为虽然道德领域有确定的、不可移易的法则,但道德领域之遵从这些法则不及物理自然之遵从它的规律来得一贯。其理由在于,具有悟性的个人是有限的,因而是会犯错误的,并且还是按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志行动的。因此,他们并不永远服从他们为自己订立的基本法则或准则”。自然科学的主要功用是在实际方面的直接利用和在理论知识方面的规律演绎,历史学研究缺少这些方面。即使历史学力求用同样的方法去发现规律,这并不是赋予历史研究最高价值的东西,对历史的理解必须考虑到构成社会基本纽带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的真实性是由史料真实和历史认识真实的相对性所决定的。“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到的事实的记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到的事实的解喻是正确的。”历史认识客体和主体的性质决定了历史认识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历史认识比科学认识要复杂得多。这不仅在于认识客体不可重现,而且无法排除认识主体的认识取向。事物是发展和变化的,事物的面貌性质随时间流逝和空间位移呈现变化,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尽管历史事实不会改变,但对历史的认识在逐步深化,这并不因为它更接近历史客体,而是因为它更接近现实。新史学尤其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不可分性,强调历史主体的作用,而传统史学把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割裂开来,反对主体的介入,认为这样才能“公正”、“客观”,事实上脱离环境孤立研究是

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科恩:《科学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页。

屈维廉:《克莱奥——一位缪斯》,载于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1~202页。

幼稚的。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中的如下观点表示了怀疑:“历史学家应该是客观的”;“理性使历史学家们有能力去说明过去。”既然历史研究过程的实质是对史料进行探索,历史研究的核心必须是理解,历史必须人性化。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历史研究是对人类的语言进行研究,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各种文献和遗迹,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与其说是一个科学家不如说是一个语言学家。一切史料都是话语,包含着意义,可以交流,具有被理解的可能性,历史学家在研究活动中注入了自己内在情感。历史学家的介入可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像“据我所闻”、“据实而言”等开场白;现在时态的使用标志着史学家的介入,或者标志着对史学家个人经验的任何谈论。认为那种把历史研究看成是客观的、没有情感取向的想法是天真的。

历史是人的活动,研究历史同样是人的活动,历史学不能忽视人文价值,忘记人文精神。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感情,而这是自然科学无法真正把握的东西。“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金斯伯格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伽里略以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文科学处于两难的窘境中:“要么为创造出重要的成果去采纳科学性很弱的标准;要么采用科学性很强的标准却只能创造出意义不甚重大的成果。”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对比,那就是人类在驾驭自然方面的能力日益增长而在控制自身环境方面日益无能。历史学应该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看来,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有人认为,历史学只部分地是一门科学。或者说,作为科学,它还存在很多缺陷。

### 三

史学如果只是科学,那就扼杀了史学自身。科学的殿堂决不比艺术的殿堂更神圣和伟大,艺术对丰富人类生活也同样不可缺少。刘节在《历史论》中也曾说过:“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不要僵化史学方法。

人们主张历史是艺术的出发点强调的是历史的实践功能,资鉴范型是斯托扬诺维奇将历史科学划分出来的基本范型之一。历史学的真正价值是在教育方面,它能够使人们回想过去,从而启迪心智。屈维廉认为:“历史有三种不同的任务,我们可称为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恢复我们祖先的某些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历史学家所能完成的最艰

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1~92页。

巴尔特:《历史的话语》,载于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83页。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5页。

伊格尔:《欧洲史学新方向》,第4页。

巨、最微妙和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工作。”

主张历史是艺术不仅考虑历史的上述教育功能,而且关注其认识功能,这一点也为很多人所强调。历史最重要的认识功能在于它能帮助人类认识自我,这是与艺术相同的。当代哲学家卡西尔提出:“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

历史作为一门艺术并不仅仅在功能上与艺术相似。历史著作是一种文学作品,它通过生动、具体、形象的叙述把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古罗马的琉善在题为《论撰史》的史学理论文章中,系统地论述了史学的“真实之美”、“秩序之美”、“文字表述之美”三项审美原则,类之,现有的史学名著不乏其例。梁启超谈到《史记》“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文传人;《史记》之列传,惟借人以明史”。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说得好:“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事局中,潜心腔内,忖工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历史学的美学价值是其存在的理由之一。

历史如果又是一门艺术,那就可以突破科学对历史学的限制和局限。把历史看作一门艺术,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看法,历史女神位居九个文艺女神之首,19世纪才独立,然而,这种独立是以丧失自己的个性,将自己淹没在科学行列中为代价的。它使大多数历史论著变成了枯燥乏味的资料堆砌,缺乏思想,不再是使读者获得教育和享受的艺术作品,仅仅成为极少数专业人士间进行的干巴巴的对话。历史丧失了自己最古老也最重要的传统,即作为一门艺术的传统。现在人们重新捡起最古老的话题,争辩说:历史是一门艺术,或者历史除了其他属性外,它同时是一门艺术。历史的客观与艺术的客观很相象。历史研究人、认识人,不是研究个别人,或人的个别方面,而应是人的总体,研究者应为使历史学更富有人性而努力。

历史作为一门艺术在思想上的解放也带来了研究手段的多样化。如果历史只作为一门科学,在科学成果的体现上局限很大。科学力求真实反映客观世界,它的认识手段主要是实验,使用的语言高度抽象概括,尽力避免社会和个人的干扰。而艺术则不同,它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映是形象的,要求神似并着力于形似,所以它具有更多的个人感情色彩,因而比科学有更宽阔的认识领域,使用的语言更加丰富。“艺术既表现人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就在于此。”如果历史学作为一门艺术,它体现成果的手段和方法就多样化了。艺术的很多表现手段和方法历史学都可以借鉴和利用,历史学家应该千锤百炼写出优秀的历史著作。合格的历史学家应该不仅具有学术能力,而且具有艺术修养。古人云:文人不能写史,史家必须通文,它表达了

屈维廉:《克莱奥——一位缪斯》,第192、184页。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1页。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7页;《饮冰室文集·历史》,第13页。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4页。

同样的思想。这样必然会给历史学带来飞跃,更加发挥其科学性。

历史研究中叙事方法就是一个显例。历史就是叙述事件,叙事就是把历史上局部的、混乱的和不可理解的情节联系起来,加以理解和解释。近代历史著作忽视了叙述的艺术,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它们所叙述的事件不“生动活泼”,像静止的池水而不像奔流的大河。历史的艺术始终是叙述的艺术,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历史学的主体已经从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了文化和情感;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了个体;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评判标准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历史的叙事既是一种方法论,又是一种认识论,叙事与分析应该有机地结合。

历史研究中的新人文主义倾向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新人文主义并不排除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我们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是一种双重的复兴;对于文学家是科学的复兴,对于科学家则是文学的复兴。”新人文主义对文化研究的肯定涉及到对技术进步的价值怀疑,这种怀疑主义“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各种价值重新回到了学术分析的中心舞台上。”历史发展的新方向表现为,“从依靠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转向强调难以捉摸的文化意识因素的方法。”

“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它的探索则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崇高的表现。”如果我们将历史学既看成是一门科学,又看成是一种艺术,在历史研究中就既能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又能有艺术的思维和创造精神。理想的历史学,应该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应该既作结构的分析,又作事件的叙述;应该既是总体的宏观研究,又是个体的微观研究,总之,应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历史学以独特的方式集合了艺术和科学的某些特征,它在知识的分支中具有独立的地位。

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其他学科的发展对自身进行相应的改造,又不能丢弃自身的优良传统,而在此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

(作者舒晓昀,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后)

(责任编辑:陈启能)

(责任校对:姜 芃)

斯通:《叙事史的复兴》,《过去和现在》,1979年第85卷。

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和122页。

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页。

伊格尔:《欧洲史学新方向》,第2页。

李政道:《艺术和科学》,《文艺研究》,1993年第2期。